

荀學的知識生產、傳播及閱讀： 以中國近現代期刊（1894-1949）為核心

周志煌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晚清民初之際，為因應時代思潮及政治、社會、文化改革等需求，荀學當中的重要概念及相關知識，常透過期刊藉以宣揚傳播，引發迴響及討論。相較於有系統的、脈絡化處理的《中國哲學史》或《荀學研究》……等專門著述，散逸在期刊裡頭諸多荀學概念的闡揚，乃至因應時代的「借題發揮」，何嘗不是近現代荀學史中的一環？且這些期刊荀學言說數量龐大，含括知識菁英及一般普羅大眾的話語。

本文對於這些期刊裡的荀學文獻處理，並不在於討論這些言說是否相應或悖離先秦荀子之說而作價值評判。相對的，是聚焦於從知識傳播、閱讀接受以及詮釋者的角度，來考察清末民初學人及相關文化界人士，他們是如何結合時代思潮之變化，藉由晚清以降興起的期刊等公共媒體，來詮釋並發揮荀學相關概念。其眾聲喧嘩之狀在晚清民國學術史上，又有哪些特徵及思想意義值得關注。

關鍵詞：晚清民初荀學 近現代期刊 知識生產傳播 閱讀詮釋 廣告 書評

荀學的知識生產、傳播及閱讀： 以中國近現代期刊（1894-1949）為核心

周志煌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本論文所指「近現代」，包含 1894 年甲午戰役之後帶來中國思潮巨變，到 1949 年兩岸分治為限。所引用之期刊文獻材料，是依據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開發的「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1-11 輯）進行檢索蒐羅，這兩個數據庫包括二萬多種晚清民國各式報紙與期刊，共有一千多萬篇之文獻，與荀學有關之近現代報紙與期刊文獻，亦超過 500 篇以上，因囿於論文篇幅，本文僅就荀學議題能呼應晚清民初思潮變化，以及在近現代知識生產、傳播及閱讀當中，對於荀學闡述具有特殊觀點及反映時代思潮之「期刊」文獻進行解讀。就撰者、讀者而言，選擇學術界知識菁英與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就相關議題各徵引數篇為代表，希冀透過近現代期刊之學術、文化史料，以補過去晚清民初荀學相關研究之不足與闕漏。

1918 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的〈發刊辭〉曾有下面一段話：

雜誌之名，蓋昉於戰國時《荀子·勸學》篇，有學雜誌順詩書之語。楊注雜誌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也。遭秦燔書、漢黜百家，古之雜誌遂不傳。近世各國學者彙眾說為一編，旬布而月刊之，賡續不輟以詔國人者，所在多有。吾國人譯其名曰雜誌。復相率仿其所為，官師學校政論學說樊然並興，都其

目不下數十百種，篤舊者或病其繁猥，然猶未逮各國之多且盛也。^①

〈發刊辭〉的撰文者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先驅江謙（1876-1942），其早年就讀於徽州紫陽書院、南京文正書院，江謙雖為傳統學者，然其注意到晚清以降，傳遞思想的重要媒體「雜誌」（「期刊」）的知識生產及傳播作用，特引《荀子·勸學》：「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②說明古代「雜誌」為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並將之作一轉語，強調現代「雜誌」對於知識學習的重要。事實上，晚清民國以來雜誌所登載的學術資源，不僅止於「官師學校政論學說」，以荀子思想而言，除傳統學者依循過去對於孟荀人性思想，以及先秦諸子之間的政治、社會言說進行比較之外，荀學與晚清以降西學的對話，乃至民國以來軍閥混戰之內憂，以及日本與西方強權之外患，荀學相關觀念作為國民熟悉且共享的學術文化資源，相關文句引用或觀念闡釋，也常為各類型的期刊所登載。在撰文及閱讀者的身分上，含括了知識菁英及通俗大眾，可以說學術或大眾期刊呈現了蔚為可觀的荀學話語。

有些原刊登在期刊中討論荀學的文章，當收入作者自身編選或後人編撰之文集（全集）當中，其學術材料往往經過歸類或修訂增刪，若這些學術材料原先曾發表在期刊之中（民國學人著述多先循此管道問世），有時經過文集（全集）之整理，或依類型、主題等加以分類，如無特別註明原出處刊物或發表時間，往往會失去其所反映原刊文獻時代的學術特色或歷史現場，更不用說在原來期刊登載所屬之欄目為何？原稿是否屬於特定專題策劃的篇章之一？還有哪些比鄰的其它專題文章？文字編排情形（一次或數次刊登？文字走向？是否有圖像搭配說明？），以及此篇寫作是否在回應先期刊中他人的學術意見？以上種種，都是期刊裡頭有關學術性的文獻值得注意的現象。

例如楊大膺 1936 年出版的《荀子學說研究》，對荀子之〈正名〉、〈解蔽〉

① 江謙：〈發刊辭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1 卷第 1 期（1918 年 9 月），頁 1。
② 「學雜識志」楊倬注本作「雜誌」，王引之認為「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頁 9。

二篇細加分析，並與西洋論理學、佛家唯識論相互比較，可說是荀學特別之發明。全書除緒論、結論外，中間共分十一章，分別為「性論、欲論、天論、禮論、樂論、勸學、修身、正名、王制、議兵、解蔽」，這樣的篇名安排，誠如作者指出：「本書各篇立名，均以荀子原名為準，有與今名意義相符合者，則以今名解釋之，既可以保存荀子之真目，亦可以使讀者一見瞭然。」^③然而楊大膺書中各篇相關的文章，原先多發表在不同的期刊之中，且篇名並非「以荀子原名為準」，反而利用當時流行的學科知識，或哲學裡頭的專有名詞作為篇名。例如〈荀子的認識論〉（《世界旬刊》第13期，1932年）；〈荀子教育哲學〉（《哲學評論》第5卷第2期，1933年）；〈荀子政治思想〉（《覺是青年》第1卷第2期，1934年）；〈荀子的生命哲學〉（《覺是青年》第1卷第3期，1934年）；〈荀子的修養論〉（《覺是青年》第1卷第4期，1934年）。後面三篇都發表在《覺是青年》這一雜誌，《覺是青年》1934年於南昌創刊，而國民政府倡導之「新生活運動」也正是1934年在南昌開始推動。因此《覺是青年》的發刊宗旨定位在「灌輸時代知識，發揚民族精神」。而楊大膺以荀子的「政治思想」、「生命哲學」、「修養論」接連三期刊登，亦與喚起青年之學養相呼輝映。以民初學術思潮為例，諸多學術議題的申發及闡述往往與民族主義形成一種共構的關係，例如1938年《今論衡》第1卷第1期刊載〈抗戰叢談：荀子之抗戰必勝論〉就是一例。

著名政治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在提到作為民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的形成時，特別著重於現代印刷文明和現代大眾傳播媒介的力量。因為居住在特定領土之內使用不同方言的大眾，憑藉著共通的印刷文字來瞭解對方，使他們自認為已經合一。這種共同的閱讀經驗讓他們協同社會時間與空間的想像的能力，使他們同步想像和經驗發生在遙遠地方的事件。「報紙」等現代傳媒使人們與一個廣大的世界發生了想像的關聯。^④如果進一步參照彼得伯克（Peter Burke, 1937-）《知識社會史》一書中所作的相關討論，從知識的蓬勃發展（古騰

^③ 楊大膺：〈荀子學說研究例言〉，《荀子學說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2。

^④ （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9年），頁17-47。

堡的印刷革命），到知識開始被考量如何處理和分類（以狄德羅發展百科全書為主），⁵「期刊」不僅承載著知識實體化的歷程，同時也見證了知識如何被引入機構裡（如政府機關刊物或學校校刊），甚至各地期刊散佈所展現的「知識地理學」，以及知識如何透過期刊展現其話語權力的「知識政治學」……等等。如果進一步追問，讀者、聽者、觀察者或消費者眼中的知識，是如何與近現代期刊，以及其他出版商品產生鉤合？從楊大膺荀子研究的相關例子，吾人既可以看到原先篇名及文章內容在期刊中的分布，以及學術文本原初的樣態，而刊物屬性及期刊閱讀者品味，亦有可能影響作者的篇名設計及撰述內容。若再進一步比對出書之際，作者如何統整編排各篇原刊內容，以及配合書局的行銷策略改變篇名，這些調整都可以融入到整個知識生產的機制運作來加以衡量。

二、荀學知識的生產：觀念演繹與詮釋

晚清民國以來，為因應時代思潮及政治社會改革等需求，荀學當中的幾個重要觀念詮解，常透過期刊藉以宣揚傳播，引發迴響及討論。就知識屬性而言，期刊所載有些是舊議題繼續延燒，如孟、荀人性及政治觀比較，或荀子在儒學以及先秦諸子中的定位、荀子〈成相〉及〈賦篇〉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等等。相對於舊論題，更多可見的是新議題的開拓，如荀學與群學（社會學）、名學（邏輯）、富國（經濟）、科學……等如何對話？以下就數項議題舉隅以作說明。

（一）群學

自晚清嚴復（1854-1921）翻譯《天演論》，以及維新派梁啟超（1873-1929）倡議所謂「新民」概念，關於求競生存之道，以及民族國家之「國民」該具備之新道德為何？荀子〈禮論〉：「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⁵ 詳參（英）彼得伯克著，陳志宏等譯：《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英）彼得伯克著，汪一帆等譯：《知識社會史（下卷）：從〈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涉及人性之「私」及禮之施設的相關討論，以及〈王制〉：「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有關群而能分之社會如何強大等相關言說，就不斷被提出討論。且這一討論往往被納入「私與公」、「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中來衡量。《東方雜誌》1906年的「社說」欄就有〈箇人說〉一文提到：

夫其所以敗壞公德者何也？曰：私而已矣。私者利己之謂，立物我、分町畦，為一事必等量利害，於我於人之分，數多寡以為準。於是鄙吝驕貪侈詐等弊，緣附而叢生焉。墨子曰：亂何由起，起於不相愛。荀子曰：人各私其所私，則人人交相私，而天下離散。西儒斯勒氏之言曰：我人處處便自私，然不敢自私者，以恐害公益故。總此以觀，而知抑私以利人者，是為善羣之功臣；損人以逞私者，是為敗羣之賊子。^⑥

以墨子、荀子所言與西儒對話，認為中國富強之道，在觀念上必須「抑私以利人」。同樣的看法，在倚劍生〈論中國政教宜求進化〉一文也有論及：「希臘名哲雅理斯多德有言曰：人者，社會的動物，斯言也。凡西國之政法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無不宗尚其說。然求其原理，即荀子所謂民生有羣。」^⑦作為社會之動物，人之欲望該如何調節？社會之運作如何做到不僅可滿足個體需求，也能讓群體欲望得到控管平衡？晚清以降諸多有關西方生計學或經濟學的論述，一再提及「欲望為經濟之母」，〈經濟：普通經濟學：論慾望〉一文就說道：

慾望者，經濟之母也。……吾人生當今世，求免為各國所吞併，毋言寡慾也。苟進於文化的，惟患其不多耳，毋言窒慾也。苟知有國家，惟患其不通耳，蓋慾望者，非古聖賢私慾之謂而有生俱來，介在性與情之間，為經

⑥ 不著撰人：〈箇人說〉，《東方雜誌》第3卷第10期（1906年9月），頁207-208。該文作者不詳，題下標明「錄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南方報」。

⑦ 倚劍生：〈論中國政教宜求進化〉，《東方雜誌》第3卷第5期（1906年4月），頁99。

濟原始之要件所必不可忽者。^⑧

以此西方經濟學所強調的人性基礎來對應中國先秦思想，《荀子·禮論》：「人生而有欲……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的相關思想，就常被放在群我關係以及「社會欲望」整體如何調配的經濟學理中來思考。如唐慶增（1902-1972）在〈荀子之經濟思想〉一文中就指出：

其經濟思想多散見於〈富國〉、〈王制〉、〈王霸〉、〈儒效〉諸篇，此外如〈大略〉、〈正論〉諸篇，亦有不少關於經濟事物之材料。至其消耗理論，皆在其〈榮辱〉、〈性惡〉二篇中言之。近世經濟學，大抵可分為消耗、生產、分配、交換及財政五大部份，我國古代思想家，論及分配及交換二項者較少，於消耗論中之慾望問題，討論者獨多。荀子於慾望之性質，有極詳細之討論，實為彼之主要貢獻。^⑨

荀子這些有關現代經濟事物之觀念群組，在晚清民初學者的解說下，都不約而同的涉及到個體自然人欲、群體社會人欲該如何看待的問題，由此並延伸出「義」與「利」；「私」與「公」等古典與現代的思想課題探索。「人性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一直是歷代思想家關切且爭喋不休的話題，形成性善、性惡、性有善有惡、性無善無惡等見解之差異。大抵而言，這些議題討論不外乎是環繞在道德與欲望之先天或後天、本質或自然，以及人性在社會化的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情形等等加以闡釋。事實上，道德與欲望從來都不是化約的二分對立，在個體與社會錯綜的關係取向裡，欲求所涉及的道德倫理課題，也常充斥著複雜的辯證關係。

吳統續在 1918 年的《法政學報》分期刊登〈荀子統一主義之評論〉一文，在

⑧ 不著撰人：〈經濟：普通經濟學：論慾望〉，《湖北學生界》第 4 期（1903 年 4 月），頁 25 及 31-32。

⑨ 唐慶增：〈荀子之經濟思想〉，《大夏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9 年 5 月），頁 35。

〈再續〉當中，他將荀子之心性觀與群學觀念結合起來，既言「天賦自由」的權利，也提及為求生存永續，所有自由的行為必須有其「界」，才能在群而能分的社會生活中有其秩序，吳統續說道：

易言乎『自由』，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是矣，曷言『秩序』，井井兮其有理也，脩脩兮其有統類之行也。是矣，如是則知自由不可以無範也；秩序不可以無軌也。故熙熙而樂人之藏，隱隱而恐人之不當。吾適所安，而人不我賊。各有其界者。乃自由之範也。故厭厭而能長久，綏綏其有文章，利害共通，生存永續。各獲其益者，乃秩序之軌也。惟斯二者之相關，則社會於焉形成。人人之『天賦自由』 Natual Liberty 均變為『法賦自由』 Civil Liberty。守其義，執其分，和合調一膠固而治。此『國』與『天下』之統一之真義也。¹⁰

這裡引用荀子〈儒效〉所言：「井井兮其有理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這一大段話，認為聖人掌握禮儀法度，其言行及施政作為能帶來禮法的昌明，這樣昌明的秩序在吳統續看來，是由『天賦自由』（Natual Liberty）進展到『法賦自由』（Civil Liberty）重要的指標及分水嶺。若依吳統續引荀子〈儒效〉原文提及「聖人」來說，吳氏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自由」觀念上，安排了「聖人」來制訂禮儀法度，統攝所有群體當中個別之「類」使其井然有序而不逾「界」。另外，吳統續對於荀子〈王制〉所謂：「人何以能群……疆則勝物」這段話，一樣認為涉及到自由與秩序的概念，他指出：

人為有理性之動物，所以能羣。『最為天下貴者』，萬物之靈也。『分者』，自由之量也。『義者』，自由之界也。『和者』，秩序之端也。『一者』，統一之源也。由後之說，則明制羣之由。政之所生，國之所立，皆有因也。¹¹

¹⁰ 吳統續：〈荀子統一主義之評論（再續）〉，《法政學報》第3期（1918年5月），頁1-2。

¹¹ 同前註，頁3。

因此吳統續認為有效的政治管理，其中關鍵即在於當人行使「天賦自由」之際，對於聖人在群體秩序管理中所做的「度量分界」能夠遵守，如此則可達到「法賦自由」的秩序維繫與施展。

（二）政、法之學

就學科知識分類而言，「政治」、「法律」各有其學理及運作施設之對象，然而在傳統中國思想論域來說，政治、法律等關乎治國、平天下之社群倫理的學問，常是緊密扣合難以區隔。民初學人面對新舊學術思想交替磨合的時代，對於現代「法學」思想與傳統孟、荀關係為何？也多有所討論。如曾擔任《公言》、《中華》等期刊編輯與北京大學講師的劉少少（1870-1929），就曾以孟、荀二子名之為「儒家法學派」，以別於純粹儒家學派。然其所謂「法學」，指的是：「治國之方法、各種政法制度，亦復具體可以立案畫策」。¹²劉氏並就孟、荀比較二者法學思想之異同，在「同」的部分，其見解包括「荀子與孟子在法制上根本觀念相同之一巨識者，則均視天子為國家中一種官職，而不如後世之視君主為神聖皇帝之特別種級」；「凡國家之有法不能專重在法，尤必重在立法行法守法之人，此其二子所以皆當為儒家法學而不同於申韓等專門法家之論者。」¹³在知識分子高倡民主的民初政治氛圍中，劉少少認為孟荀之見是一「偉大學說」。至於荀孟「法學觀」之相異處，劉氏也指出：「荀子取法先王更重取法後王；孟子則但重取法先王不及後王」、「荀子之於官制不主張世祿制度；孟子則主張世祿制度」、「荀子於法學之外最能講求名學；孟子則殊未究研名學之理」、「荀子於聖門禮義說之外兼攻詩學；孟子於聖門仁義說之外兼攻春秋」……等。¹⁴以上劉少少採取孟、荀之說來對應西方「國家」意義底下的政治觀念，雖為粗略，但也反映共和政體肇建底下，學人從傳統思想資源找尋對應西學的論述趨向。

除傳統孟、荀政治主張之比較，晚清民初荀子學說最常拿來對應的則是霍布

¹² 劉少少：〈儒家之兩大法學派〉，《東方雜誌》第15卷第10號（1918年10月），頁79。

¹³ 同前註，頁82-83。

¹⁴ 同前註，頁87。

士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及其政治哲學代表著作《利維坦》(Leviathan)。1901年梁啟超於《清議報》發表〈霍布士學案 HOBBS〉，介紹霍布士的政治哲學，言及霍氏的社會契約理論及絕對君主思想。其中還特別拿霍布士學說與荀子相較，梁啟超說道：

霍布士之學，頗與荀子相類，其所言哲學，即荀子性惡之旨也，其所言政術，即荀子尊君之義也，荀子禮論篇曰：『人生而有欲，……給人之求，』此其論由爭鬪之人羣，進為和平之邦國，其形態級序，與霍氏之說，如出一轍，惟霍氏之意，謂所以成國者，由人民之相約，而荀子謂所以成國者，由君主之竭力，此其相異之點也，就理論上觀之，則霍氏之說較高尚，就事實上驗之，則荀子之說較確真，而荀子言立國由君意，故雖言君權，而尚能自完其說，霍氏言立國由民意，而其歸宿乃在君權，此所謂操矛而自伐者也。¹⁵

此處比較中西政治思想，談論國家的來由及形成背景，並涉及人欲之滿足與否與治亂之關係，最後還言及霍布士學說之矛盾，反證荀子之說「尚能自完其說」。到了民初，雲鉞在 1927 年刊登的〈浩布士與荀子政治哲學之比較〉一文中，一樣由人性問題來探討國家的起源，在人性的認識上，雲鉞認為荀子與 Hobbes 都以人之天性極惡，縱欲而不窮，不能不爭。然而即使荀子與 Hobbes 兩人，有著高度相近的人性觀，在國家起源論上，兩人卻又發展出不一樣的想法。雲鉞認為「浩布士論國家之起源，由於民約，而結果歸於君權。荀子論國家之起源。始終出於君主之竭力。」¹⁶除了以國家主權、法治等西方政治哲學觀念與荀學進行對話，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者，亦有關注西方人權價值中所謂「平等、自由」之意含，並以荀子之學說、觀念進行交流。其中李俊在 1934 年發表〈荀子與霍布士 (Tomas

¹⁵ 梁啟超：〈政治學案第三：霍布士學案〉，《清議報》第 97 期（1901 年 11 月），頁 2。

¹⁶ 雲鉞：〈浩布士與荀子政治哲學之比較〉，《清華週刊》第 26 卷第 7 期（1926 年 11 月），頁 609。

Hobbes) 〉特別指出荀、霍二氏都認為：「一為人生而平等，一為人欲惡同物。」¹⁷當人「欲惡同物」之際，眾物無法足夠且有效的「度量分界」分配到所有人手裡，則必有爭亂的產生。而且由於人「生而平等」，則必各不相下，爭亂更是無有停歇之際。如何避免並解決性惡帶來的禍害？李俊認為荀子主「明分」；霍布士則主「建立主權」，都是為瞭解決性惡帶來的問題。荀子「明分」著眼於制禮樂以劃分人類之「倫理上的責任」，¹⁸在「明分、安分」當中，使人願意為善，追求「美善相樂」的人生；相對的，霍布士「建立主權」之說，則經由契約擁戴而來。人類因憂死之念與求安之心，必須擁戴一人或數人為一主權者。以上梁啟超、雲鉞、李俊所作之觀念對接闡釋，都是荀子、Tomas Hobbes 在晚清民初「接受史」中的重要論述。

（三）名學

除了群學及政法之學等相關討論，荀學另一闡釋重心則在「名學」。有關名學的議題，不僅是在名與實之概念、稱謂，以及延伸出的新語詞等翻譯問題的討論，還涉及政治運作等實務經驗操作如何確立「名」、「實」之關係，以及政府權力與學術自由之間的界線該如何拿捏等相關課題。

在晚清的期刊中，《教育世界》、《四川學報》等兩個期刊討論「名學」文章頗多，特別受矚目的是 1905 年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說道：

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

¹⁷ 李俊：〈荀子與霍布士（Tomas Hobbes）〉，《珞珈月刊》第 1 卷第 4 期（1934 年 2 月），頁 294。

¹⁸ 同前註，頁 296。

事，則除迫於實際之需要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與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¹⁹

王國維之文除了談到語詞與思想之關係，同時比較中西思想之特色，王氏認為西方由於「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爲了讓事類與物類等概念知識能更爲清晰明確，故語詞之劃分與指涉相對也會更爲精細多樣。當王國維認為「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這樣的說法在三十多年後張東蓀（1886-1973）辨析中國只有「唯名論」而無「唯實論」的文章中，引荀子與亞里斯多德作爲對照，有更爲清楚的說明：

因為中國言語構造上不注重主體，以致謂語的存在亦不十分分明。其影響於思想上則必致不但沒有本體論，並且還是偏於現象論（phenomenalism 亦可稱爲汎象論 Pan-phenomenalism）。……我嘗推其原故，以爲中國人所以偏於現象論是與中國人的造字有關係。中國的字是象形文字，因此中國人注重於觀象，因象而取名。所以須知儒家一流之正名論與辯者一流之形名學，都是主張定名必須合乎象，而「理」亦正含於象內。……中國思想總是因萬物之然而各定以名，因名而見理，因理而有秩序，於是治亂乃得判分。至於所謂「以類取」與「以類予」，乃根據「辭以類行」而來。但於此所謂「類」，卻決不和亞里斯多德所謂 genus 相同。於此所謂以類取即等於取比，取比亦就是取譬，以其相近相似而比之。乃是觸類旁通的意思，並不限於指其有所屬。……中國人思想對於主體與屬性的分別不十分清楚，所以對於「類」的觀念亦決不合乎亞里斯多德的程式。須知屬性的存在是依靠主體的不可缺少。既然「云謂」不十分顯明，則當然屬性的概念亦不會發達。這便是汎象論的一個特徵了。證以荀子上正名篇所說的下列一段更爲可信：「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可見名由人而定，類由約而成。中國只有唯名論（nominalism），而無「唯實論」（realism），唯名論與現象論又是有

¹⁹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4月），頁1-2。

相當關係的。²⁰

文中所言「類」之思維正是荀子思想的一大特色，至於西方所說「云謂」關係，是指對範疇的解釋性說法。對於荀子〈正名〉而言，心與五官共同作用來辨別各種事物，就其同異分類，而以事物之通性約定通名；以事務之異處分立殊名。這樣的分類及命名，在近現代中西、新舊文化的思潮變革及對話中，如何讓思想文化及其附著的觀念、語詞，產生群眾認可最大的「公約數」？如何讓新學語（翻譯詞彙）進入知識界產生共同認知及言說之可能？《荀子·正名》：「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這句話，就常成為新舊思想對話當中一個可以參照的方向。例如《東方雜誌》在1918年有一則〈敬求學界同人發起名約會啓事〉，其目的就是希望召喚各界組成協會，共同商議決定各專業知識之「標準」語詞，該啓事說道：

比閱報章雜誌，北京大學有研究所之設，以教育部移交之名詞館稿，為研究之一部。留美科學社有編訂暫行名詞表之舉；上海有譯名統一會之設；從前中華工程師會曾有工學字彙刊行；醫學名詞審查會曾審定醫學名詞數項；博物研究會亦有編訂博物名詞之舉。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開辦最久，當然編有譯名對照表，科學會亦有譯名對照表數種，未經發表。此外學術團體、個人著述，編有譯名對照表者，亦復不鮮。又各種專科詞典，當然為譯名對照表之一種，羅而致之，各種科學名詞，將燦然大備。正名之事，可從茲始。惟是正名，宜定標準，倘無標準，名何由正。……決定名詞，責在學界同人，非異人任。為今之計，宜結名約。善乎，荀子之言曰：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蓋謂名約成然後有實名善名，有實名善名然後有所遵守也。結名約奈何，曰：聯合多數學者創一名約會，

²⁰ 張東蓀：〈從中國言語構造上看中國哲學〉，《東方雜誌》第33卷第7號（1936年4月），頁94-96。

以協議決定名詞為宗旨。²¹

《東方雜誌》屬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而上海商務印書館又是民初翻譯書籍、辭書出版之重鎮。誠如文中所述：「惟是正名，宜定標準，倘無標準，名何由正。」，而荀子的「約定俗成謂之宜」成為訂定標準的主要參考依據。除了各行業及出版品對於專有名詞的統一譯名訂定外，大學裡頭知識的專業及相關譯名，也有「正名」之必要。北大哲學系教授賀麟（1902-1992）在1936年就曾指出：

現在據個人所知中國各大學哲學系，似已漸漸注意於西洋名哲的研究了。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斯賓諾莎、休謨、康德、黑格爾、北平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兩校都曾開過專門研究的課程。這總可算是一好現象。出版界，對於西洋名哲的翻譯與介紹的著作，我們可以預言，一定是會日益加多的。不過講到翻譯介紹西洋名哲的名著，則對於譯名一事卻不可鬆鬆放過。在別的地方，我都很贊成經驗派的荀子「名無固宜，約定成俗謂之名」的主張……在哲學的領域裏，正是厲行「正名」主義的地方，最好對於譯名的不苟，是採取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態度。尤其中國現時之介紹西洋哲學，幾可以說是草創時期，除了襲取日本名詞外，幾乎無「定約」無「成俗」可言，所以對於譯名更非苦心審慎斟酌不可了。²²

先秦時期荀子正名觀念及相關名學探討，原無關乎翻譯問題，然而近現代學人摘取《荀子》文句並運用其觀念加以引伸發揮，從閱讀接受的角度，也經歷了某種創造性的詮釋。除了譯名討論之外，荀學之「名學」，在民初知識論域中，另常被拿來相提並論的就是西方邏輯學及印度因明學。然而對於這樣的「類比」是否恰當？學者意見不一。例如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劉叔雅（1889-1958），就

²¹ 不著撰人：〈敬求學界同人發起名約會啟事〉，《東方雜誌》第15卷第3號（1918年3月），頁153。

²² 賀麟：〈康德譯名的商榷〉，《東方雜誌》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頁182。

認為荀子名學並不能與西方邏輯學、印度因明學等量齊觀：

近世羅輯說到最高處，有認識論的羅輯。中國古代墨子的經下，已經講到了「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所以使人知之……」的話。荀子的正名篇，也提到了「緣天官」的話頭，這自然是墨子荀子的高處。然而卻不能說西洋羅輯、印度因明，都是拾我們先秦諸子的唾餘。或是說荀子墨子的學問，和西洋近世學者的學問，有同等的價值。因為他們二位不過是提及這句話，見到這一層並未能有精密的研究，下正確的解決。²³

劉叔雅對於拿中國名學、西方邏輯、印度因明相互比附所存在的顧慮，可以說也正反映晚清以降在文化思想「格義」過程裡所可能產生的概念混淆，尤其這種混淆若挾帶著民族情緒形成高低優劣的價值評判，就難免失去了對於學術的實事求是及客觀評判。例如吳熙就大加讚賞荀子名學的「高貴」：

荀子的名學，不但可以拏來求出種種的真理，並且可以拏來做兩造辯論的公例，比較西人論理學的三段法，也要高貴得多。因為西人論理學的三段法，不過是拏來演繹斷案或歸納原理，只有自悟的作用；荀子的名學，就兼有悟他的作用了。……荀子的名學有「命」有「期」，有「說」，有「辨」，比著印度因明學的三支法分做「宗」「因」「喻」三支，似乎要明白得多。²⁴

這種高度推崇荀子名學成就的，也反映在當時的學術用書上，儲炳源就曾說道：「去夏讀《荀子》，嘆其論理學說為吾國大家。近讀桑木嚴翼著《哲學概要》、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二書，其論此點與源意相吻合」²⁵對於荀子這樣的論理

²³ 劉叔雅：〈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鈞通〉，《東方雜誌》第16卷第12號（1919年12月），頁166。

²⁴ 吳熙：〈荀子的名學〉，《學生雜誌》第12卷第9號（1925年9月），頁36。

²⁵ 儲炳源：〈荀子之論理學說〉，《弘毅日誌彙刊》第1期（1920年），頁34。

學大家，該如何看待其成就？儲炳源指出：「然則荀子正名一篇……與近之所謂認識論的論理學相同，是非視亞氏等之論理學為能發見根本之問題歟！是故荀子之貢獻於論理學者，決非諸子可及。若必於歐西論理學史上求其類似之學者，則非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莫屬。」²⁶除了兩相評判比較，另有學人採折衷意見，認為古希臘早期名學並不如荀子名學，但經過長期的發展，近世西方名學的發展已超出荀子名學之成就。如張廷健就指出：「荀子正名論之概要，雖其所說簡而不詳，不足與泰西名學相匹敵，而其組織及內容視蘇格拉特之學說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荀子之論略有科學組織，可名粗具名學規模之中國名學也。」²⁷

張廷健文中提及荀子及其學說「略有科學組織」，實際上多反映在民初學人對於荀學的兩個極端評價之一：在政治體制上，因荀子尊君權，其徒李斯傳其宗旨，行之於秦為定法制，因此中國自漢以後二千年所行皆是秦制，罪魁禍首即在荀子及其學說。相對的，在科學理性上，除了名學所反映的分類思辨及對於名實關係的認識外，荀子所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天論〉），此一說法歷來被學者視為是反怪力亂神迷信的重要文獻。易白沙在《新青年》所發表的〈諸子無鬼論〉，就曾引《荀子·解蔽》：「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未可定然否也。……」一大段文字，用來強調鬼神之說的無稽。²⁸科學與宗教的關係，從五四前後一直是討論的顯學，荀子除強化自然現象變化無須恐懼的理性態度，也強調了「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論〉）的「天人之分」意義。進一步來說，荀子並將人的理性徵知能力發揮到更高鵠的：「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此一「人可制天、用天」的道理，不僅被晚清嚴復（1854-1921）拿來運用在「天行、人治」的天演闡釋裡，即使到了民初，強調仿效西方開拓自然資源以利人類物質進步等

²⁶ 儲炳源：〈荀子之論理學說〉，《弘毅日誌彙刊》第1期（1920年），頁35。

²⁷ 張廷健：〈荀子名學（即論理學）〉，《北京朝陽大學旬刊》第3卷第14期（1925年9月），頁6。

²⁸ 易白沙：〈諸子無鬼論〉，《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頁23。

相關文章，也常拿荀子「制天、用天」之主張，來對應說明從科學求知實驗，再到利用、厚生的新文明境地。

三、荀學的知識的傳播與閱讀：期刊屬性及廣告、書評

（一）期刊屬性及刊載型態

就荀學在近現代的知識傳播而言，期刊是重要的載體。荀學作為中國重要的學術文化資源，其相關論述在晚清民國以來期刊類型的分佈，極其廣泛。除了一般學校及文化界所發行刊物外，例如明水〈荀子的天道觀與人道觀〉刊登在1936年《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第1580、1851期，《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是1930年代上海鐵路局刊物。此外，像「地方學會」的期刊，如琢成〈荀卿性惡評〉刊載於《玉屏學報》1949年第6期，《玉屏學報》1947年於四川創刊，是由灌縣玉屏學會主編並發行。另有「旅外同鄉學友會」發刊的文章，如孫特夫〈荀子的教育思想〉刊於1935年《楚雁》第2期，《楚雁》是學友會刊物，由旅滬湖南學友會於上海出版，該刊是以聯絡感情，溝通湘滬文化和研究學術為要。此外，同樣作為傳媒的「廣播」，也有相關期刊發行，1937年發刊的《廣播週報》第125期，就特別刊載了電台裡頭播放的〈國文講座：樂論（三月四、五日播講）荀子〉，可以說是另類的「有聲的思想史」。

與上述特殊的期刊類型相較，荀學較常見的刊載園地，仍多見之於學校及文化界所辦之刊物。除新式大學之外，傳統國學教育在民初最具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唐文治（1865-1954）等人於1920年創辦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辦有《國專月刊》，該刊撰稿人除錢基博（1887-1957）、馬茂元（1918-1989）等老師之外，也鼓勵學生為文刊載。因此在《國專月刊》1935年第2卷第1、2期，分別可以看到學生王文蔚、鄧戛鳴所寫的〈荀子札記〉。當然，代表讀書心得的札記，不僅出現在傳統書院型態的知識殿堂及附屬刊物，新式大學亦然。上海光華大學校刊《文哲》，就刊有姜峴榮〈讀荀子札記四則〉（1939年第1卷第8期），以隨筆方式呈現閱讀紀錄。類似於札記的還有「筆記」，如

誦誨以「還讀我書齋筆記」為名，分別刊載〈荀子與孟子〉、〈荀子言慎獨〉、〈荀子言子弓〉等三篇文章於《青年進步》刊物（1925年第82期；1926年第95期；1926年第96期），可見在《荀子》的研讀之中，隨時可以摘錄經典並進行不同課題的反思。此外，亦有老師面授，學生筆錄，老師再修潤合力完成的「講記」，如譚戒甫（1887-1974）〈荀子正名篇講記〉就是一例。譚氏學生陳衍佛曾記載此一筆錄經過：「紀元十七年秋，師來大學，佛隨侍助任書寫；閒受章句，獲益甚多。今夏，江漢洪水，三伏不蒸；適居東樓，人歸地靜。句師講授本篇，時經半月，完前四章。遵命逐日面錄，錄畢，師復竄易字句；並屬別繕一分存之。用記緣起於此。時二十年九月六日，衡山陳衍佛謹識於國立武漢大學東樓。」²⁹同樣由學生筆錄老師授課內容者，還有曾在清華國學院就讀，後來擔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的吳其昌（1904-1944），其在清華就讀受學時，對梁啟超教導如何治學，就曾紀錄〈讀書示例：荀子〉刊載於《清華週刊》上。梁啟超提點揭示《荀子》讀書之要為：

古人著書，不如今日之次序分列，粲然易讀。故讀古人之書，亦不當從頭至尾讀之；必也，擇其重要之點而讀之。例如《荀子》一書，先最似宜讀〈勸學〉、〈修身〉、〈不苟〉等篇，此是荀卿門下之規程大概；次讀〈性惡〉篇，此是荀子學說之結晶，非此篇亦不成其荀子也；再次讀〈禮論〉、〈樂論〉諸篇，以觀荀子學說應用於社會者何如；再次讀〈君道〉，〈王制〉諸篇，以觀荀子對於當時政治上之批評；再次論〈正論〉、〈非十二子〉諸篇，以觀荀子對於當時學術之批評；此外諸篇，再在其後，此讀《荀子》先後次序之大略也。³⁰

²⁹ 譚戒甫講，陳衍佛記：〈荀子正名篇講記〉，《東方雜誌》第32卷第7號（1935年4月），頁164。

³⁰ 梁任公講，吳其昌記：〈讀書示例：荀子〉，《清華週刊》第24卷第13期（1925年12月），頁1。

梁任公所揭示的讀荀子之次第、方法，進一步可用在擬題撰述等學術研究的進路上。然而，並非所有學生讀荀子是基於讀書所好及學術之熱忱，亦有學生是以考試求取學歷為導向，因此在民國期刊中，還可以看到一種奇特的刊物：《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投考指南》，近似於現今考古題之「大補帖」，且還附有高分卷的答題內容提供參考。如 1927 年《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投考指南》第 5 期，就載有前一年（民國 15 年）國立北京大學國文本科入學試題：「荀子主張制天，墨子主張法天，他們對於天的觀念為什麼有這樣的不同？」⁹¹題目後附有荀、墨各自主張之原文摘句，摘句後並提醒「注意！文言白話可以隨便，但是標點符號必須加上」，⁹²該刊同期第 67-68 頁則登載得到 95 分的參考樣卷，昭示答題內容以供作為模範。

除了大學校園刊物外，中學刊物亦是不能忽略的期刊對象。如果以中國及外國人士所辦中學刊物相較，國人自身所辦刊物的荀學議題多較為傳統，例如陳慧聰〈評墨荀論樂〉一文，為蘇州私立振華女學校編輯之《振華季刊》刊載（1934 年第 1 卷第 3 期）；葉耕讓〈荀子研究〉則分多期刊載於廣州私立潔芳女子中學的學校刊物《潔芳校刊》（1934-1935 年，第 3-10 期）。至於 1936 年《南昌女中》第 3 期刊載的雷慧英〈孟子與荀子〉一文，由於江西南昌當時正推動「新生活運動」，《南昌女中》校刊編輯方針為「討論三民主義，新生活運動、教育、青年、婦女等問題」，也因此〈孟子與荀子〉一文的議題及書寫，皆不脫傳統修身及道德規訓（禮）之強化。中學生雖然閱讀傳統文獻，礙於學力難以在學術議題專研上有所突破，然若是經由閱讀引伸於時事之發揮，有時相關申論闡釋亦可見學生鎔鑄古今，借題發揮之本領。例如在外國人士所辦上海聖約翰青年會學校發行之《青年鏡》刊物，於 1925 年就刊載學生張士濤〈荀子議兵篇云兼併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試申論之〉一文，原刊全篇以古文句式為之，並無句讀。更有趣的

⁹¹ 不著撰人：〈民國十五年度入學試題：國立北京大學本科：國文〉，《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投考指南》第 5 期（1927 年），頁 19 及 67-68。《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投考指南》1924 年左右在北平創刊，主要登載全中國各大學及專門學校概況介紹，以及各校各科前一年的考題，並有答題示例供參考。

⁹² 同前註，頁 19。

是全文論及當時軍閥混戰之情狀，因各方勢力競逐，合縱連橫；使得社會動盪，政治局勢詭譎多變，難以安定。該文說道：

「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此荀卿觀乎戰國時勢而發此言者也，不謂又合乎中國今日之時勢矣。試觀昔者袁氏得志以後，即有馮、段等之攜，貳今之段氏執政未久，又將推翻曹、吳專政，而馮、胡倒戈，奉張得權，而郭氏反擊。以上諸證無非皆易於兼並，而難於堅凝者也。堂堂中國誠如一盤之散沙也……嗚呼！何兼並之易而堅凝之難也？夫利己者，人之所欲也，故有利於己者則取之，如更有利於此者，則又棄彼而取之矣。反復不定，今之軍閥多類此。……堅凝維何？曰：各去私利之心，而存從公報國之志，則不堅凝而自堅凝矣，閱牆干戈亦可知矣。惜乎徒託空言不能實現，故荀子之言得以復應於今日也。³³

《青年鏡》1911年由上海聖約翰青年會學校編輯，該刊擇優刊登學生課餘之作，因屬「教會學校」學生刊物，內容相對多元活潑。張士濤同學透過《荀子·議兵》末段「兼並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一句，分析吳佩孚、孫傳芳、馮玉祥、張作霖、郭松齡等軍閥混戰而提出針砭，深中肯綮，循此可見《荀子》在中學刊物的讀者反應亦不容小覷。

《荀子》原文之摘句除用在時事申論之外，亦有諸多刊物用之於「格言」、「座右銘」之類的標語警示，此一現象在期刊數量不少。如《杭州青年》1923年第3卷第3期在「頭版」刊頭底下，就有「格言：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荀子·議兵》）；《直聲週刊》1923年第6期有「中外格言偶錄」，其中引《荀子·樂論》君子「口不出惡言」。另，《青年勵志會會務紀聞》是由北京幾所大學學生組成發刊，1927年第2期「格言錄」欄目〈關於交遊〉一項，就挑選《荀子·勸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以作為

³³ 張士濤：〈荀子議兵篇云兼并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試申論之〉，《青年鏡》第44期（1925年），頁34-35。

交友慎選之警句。同樣引《荀子·勸學》作為格言的還有宗教刊物《廣州公教青年》1931年第1期「格言」欄目中，大段引了〈勸學〉「積土成山，風雨興焉……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工業經濟刊物《康莊》也在1936年第1卷第22期刊頭左側框起「格言」一欄，寫下「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荀子·大略》）」如果對照《康莊》雜誌的宗旨：「陶冶德性，切磋學問，努力合作，促進廠務」，對工廠同仁來說，這段《荀子·大略》文句引為格言，也相當的貼切應景。

有些民國期刊設定的閱讀者為外國人士，希望英譯中國經典讓外國友人瞭解中國文化。相對的，也有透過中英對照讓中國人透過經典之英譯進行外文學習。有關《荀子》英譯刊載的文章不少，如1915年在上海創刊的《英文雜誌》，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刊載的內容包括英語的學習體會及學習方法、英語練習題、英語短文、英語知識介紹等。其中1917年第3卷第5期就刊有〈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ED：荀子性惡篇（節錄）（中英文對照）〉，由Henry Bain（平海瀾，1885-1960）翻譯〈性惡〉：「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這段摘文。³⁴同樣一段〈性惡〉節錄文字，到了1936年《進步英華週刊》第55期，³⁵仍是用「中英文對照」，但對英文翻譯更為細膩著墨。比起十五年前同樣在上海創刊的《英文雜誌》，1930年創刊的《進步英華週刊》就更重視「雙語學習」，其〈發刊詞〉說道：「原文與譯文，當合璧並列。此種方式，實於習英語者，最有裨益。蓋中英文忠實之互譯，亦所以使繙繹一藝，人所視為較難者，稍有規範可循也。」³⁶這一〈發刊詞〉本身即是中英對照。若將相隔近二十年兩篇《荀子·性惡》之節文英譯合觀，《進步英華週刊》確有「青出

³⁴ 平海瀾：〈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ED：荀子性惡篇（節錄）〉，《英文雜誌》第3卷第5期（1917年5月），頁385-386。平海瀾英文名為Henry Bain，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曾任清華學堂教師，上海南洋公學附中主任，1917年起擔任商務印書館英文部《英文雜誌》主編。

³⁵ 不著撰人：〈荀子性惡篇（中英文對照）〉，《進步英華週刊》第55期（1936年1月），頁2。

³⁶ 不著撰人：〈發刊詞〉，《進步英華週刊》第1期（1930年10月），頁1。

於藍」的成果。此外，荀學在民國以來宗教刊物的呈現也非常多樣，除佛教或民間宗教的刊物蔚為大宗外，像基督教的《真光》、《約翰聲》，以及天主教的《上智編譯館館刊》，都有討論荀子哲學的文章，兼及與西方宗教對話，³⁷這些蔚為可觀的文獻，也是荀學與西學的另類接觸。

（二）書訊廣告及書評

近年來受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對於生活史的強化，日常生活當中關於印刷出版品的閱讀及流通廣為人所注目，尤其結合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歷史脈絡，讓出版及閱讀等相關研究有了不一樣的面貌。不同的讀者群有不一樣的閱讀知識類型，如果以出版品的物質形式要件而言，書籍以及期刊結構的組成（張、頁數，規格、版式及版面設計……）等，都因市場需求，必須顧及讀者品味而有所調整。以近現代中國來說，期刊與出版社往往相互結合，互相拉抬，構成一幅出版編輯者與讀者交流互動的圖像。尤其讀者群的構成、閱讀習慣和閱讀方式，以及閱讀大眾集體心態等等變化的情形，這部分的相關材料都是值得進一步爬梳。民初知名主編樊仲雲（1901-1989）曾說道：

出版家的眼光，為營業計，往往著重於最能銷售的書的印行，那末第一是教科用書，第二是翻印的古書，待至第三纔是一般供給知識的新書。如翻印的古書，因為買主是最富購買力的人，所以定價不妨較貴。次之教科書，因為學校通用，銷數較大，多中取利，所以定價可以稍低……但在目前，因為社會的不景氣，購讀新書的極少數人都感到貧乏無力，結果造成了出版界與讀書界（此處指真正研究用功者而言）相隔絕的狀態。故當此時，唯一溝通出版界與讀書界的辦法，似乎惟有出版界能系統地編譯新書，而

³⁷ 如張培宗：〈荀子哲學的研究〉，《真光》第25卷第2號（1926年2月），頁47-62。丁留餘：〈荀子性惡論與其哲學〉，《約翰聲》第37卷第2期（1926年），頁101-109。杜而未：〈孟荀性論與人性要求〉，《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4-5期（1947年7-10月），頁291-296。

以低廉的定價提供於讀書界。³⁸

此文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出版週刊》轉載自家發行的另一刊物《教育雜誌》第25卷2號關於「讀書問題」專號討論的文字，可代表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向。尤其對於所謂「真正研究用功者」所需出版的書籍，更是帶有某種出版倫理及社會責任意義的宣達。文中提到「最能銷售的書」，包括排第一的「教科用書」及第二的翻印「古書」，顯然這兩種銷售較佳的書籍，《荀子》都能羅列於其中。以上海商務印書館所辦的《東方雜誌》之圖書廣告而言，就常出現《荀子》的書影，如1923年第20卷第6期有以下廣告詞：「影印荀子集解 長沙王益吾先生（先謙）依楊倞注及謝墉校本，糾其疏舛，復旁采諸家之說，參酌宋元定本，附例略考證於末，並揭荀子著書之微旨，為後來讀者之津逮。六冊一元六角。」³⁹同樣一模一樣的廣告詞，到了1934年，定價改為「六冊二元」。⁴⁰經過11年既可看到此書仍舊熱銷，而物價也有些許之波動。王先謙（1842-1917）《荀子集解》應可歸入翻印古書行列，至於教科書，則出現了以下廣告詞：「荀子學生國學叢書，一冊六角，葉紹鈞選註。本書所選十二篇，均荀子書之重要者。學術思想，可見大概。標點明晰，註釋精博。編首附荀子略傳，並述學術思想概況。學生用為課外讀物，最為適宜。」⁴¹此與古書最大不同，在於配合學生學習需要而作「選本」，另加新式標點以利閱讀。

在上述樊仲雲所提到的第三種「一般供給知識的新書」，以荀子來說，這類屬於研究性質的專書，民國以來也有幾本受到關注的，如陳登元的《荀子哲學》，是編入「儒家哲學研究的專籍」，正屬於樊仲雲提倡的「出版界能系統地編譯新

³⁸ 樊仲雲：〈讀書界與出版界〉，《出版週刊》新119號（1935年3月），頁12。

³⁹ 不著撰人：〈影印荀子集解〉（「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20卷第6號（1923年3月），頁數不詳。

⁴⁰ 不著撰人：〈影印荀子集解〉（「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31卷第3號（1934年2月），頁數不詳。

⁴¹ 不著撰人：〈荀子〉（「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23卷第8號（1926年4月），頁數不詳。

書」。該書廣告詞寫道：「此書於荀子之政治學說、心理學說、論理學說、教育學說皆根據原書而為有系統之記述。書中以心理學解釋性字，並證明孟荀二子同主人有善心，尤有獨到之見。」⁴²除哲學義理的闡釋外，亦有文獻考釋之書的問世，如鍾泰（1888-1979）的《荀注訂補》，列入商務印書館之「國學小叢書」，該書廣告詞是如此描述：「荀子為儒學大宗，而其書目自唐楊倞外，別無注本。迨於有清，始有盧抱經，王念孫等十數家，加以註釋。然諸家喜糾發楊氏之誤：因有楊本不誤，而自說實誤者；亦有雖能正楊之誤，而所詮仍未當於荀旨者。著者乃就各家之說，考之於文藝，揆之於義理，重加考訂，以成是書，而為讀荀子之一助。」⁴³與《荀注訂補》同樣在193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更受矚目的，當為梁啟雄（1900-1965）的《荀子束釋》。商務印書館為此書大力宣傳，廣告詞並推許為：

注荀最精最備本，其優點有四：（一）薈萃中日碩儒校釋，擷其菁華，屏其雜蕪，簡而不疎，省而僉當。（二）今本荀子衍奪竄譌甚多，梁氏據宋明日本善本及大戴禮韓詩外傳等古籍校勘，多所訂正。（三）荀卿書蘊蓄閎富，文艱義奧，梁氏獨抒卓見，廣為增訓名物制度，微言大義，闡發無遺。（四）全書正文注文悉用新式標點。本書固為初學所棘求，亦誠鴻彥所必取也。⁴⁴

上海商務印書館除了在《東方雜誌》為自家出版之新書打廣告外，當新出版的學術用書流通到市面，同樣也會引起學界注目。像《燕京學報》在學術論文刊載之後，就常有「出版界消息」欄目介紹新出版之研究用書。對於《荀子束釋》，《燕

⁴² 不著撰人：〈荀子哲學〉（「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26卷第4號（1929年2月），頁數不詳。

⁴³ 不著撰人：〈荀注訂補〉（「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33卷第21號（1936年11月），頁數不詳。

⁴⁴ 不著撰人：〈荀子束釋〉（「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33卷第22號（1936年11月），頁數不詳。

京學報》負責編務並報導新書訊息之容媛（1899-1997）一開始也是稱頌此書之優點：「然則自王先謙集解盛行以後，至現在又宜有更定之本。梁啓雄先生為梁啓超之弟，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為底本，更集益王氏所遺及上述諸家等之校釋，參以己見，汰蕪存精，以成荀子束釋一書，可稱為後來居上之作。」⁴⁵接下來引梁啓雄自述撰寫目的及梗概的介紹此書之特色。然作為大學之學術機構，畢竟不同於出版商，即使介紹學界書訊，亦要有學術眼光予以略評，就《荀子束釋》有時某些字詞刻意反駁前人之訓解以立新意，容媛也指出：「以此解與劉師培所釋相比，似不如劉師培之圓滿。此為過於求自創一解之弊，在著者或以為空前之發現，而讀者未免墮五里霧中。校釋古書，全免此弊者，蓋不易也。楊樹達先生稱此書為普及之善本，大致尚可相稱。書末附荀子傳徵，及荀子行歷繫年表，亦可備參考。」⁴⁶整個介紹雖略指出「小疵」，然亦用「全免此弊者，蓋不易也」，以及加上語言文字學專家楊樹達（1885-1956）之背書，終肯定此書為「大醇」之學術著作。

除了期刊裡頭的「廣告」及「書訊」報導之外。「書評」亦為荀學在期刊知識傳播及閱讀過程中重要之角色。廣義來說，每個見諸於期刊對荀子學說的摘引介紹，或是論述研究，都是閱讀《荀子》原書後，行之於筆墨刊印的研究結果。至於「書評」可以稱之為對於這些《荀子》相關研究成果的「再詮釋」。前述鍾泰撰述之《荀注訂補》，商務印書館之廣告稱許為「讀荀子之一助」，然而此書到了楊樹達手裡，其書評刊載在《清華學報》，自不能等閒視之。楊樹達以二十頁評比《荀注訂補》此書利弊得失，書評開頭先介紹購書之經過，並提及尚未能閱覽梁啓雄所著《荀子束釋》之惋惜：

昨偶以事過商務印書館，見新出版諸書中有是書，隨取而觀之，首覽其自

⁴⁵ 容媛：〈國內學術界消息（二十五年六月至十二月）：（乙）出版界消息：3·荀子束釋〉，《燕京學報》第20期（1936年12月），頁606-607。容媛自1931年9月至1941年12月，超過十年以上擔任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秘書和《燕京學報》學術界消息編輯。

⁴⁶ 同前註，頁608。

序，於不苟篇：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俞蔭甫釋獨為無他事。天論篇：君子敬其在己者，俞蔭甫校敬當為苟。非相篇：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王懷祖說觀當作勸，正論篇：是非以聖王為師，王伯申說是非當作莫非，皆加以糾駁，頗能獨伸己見。而非相篇一條適與余讀荀子荀記之說闇合，（余有讀荀子荀記若干條，新會梁啟雄先生著荀子東釋，向余索稿，曾以付之。聞梁君書最近已出版，惜余未得一讀耳。）因購取一冊歸讀之，覺卷中勝義頗多，知著者於荀卿書用力頗深，非漫然從事著述者可比。在今日學術界沉寂之空氣中，青年人有一種較可信賴之諸子註釋一讀，亦可喜之事也。惟訓詁考證之業，往往不免百密一疎。著者於楊倞以下注釋諸家，盡情剝擊，固有極中肯綮者，然亦有失之不考至於誤駁者。今平心檢核，得者舉而出之，其失者略加辨論，儻亦實事求是者所樂聞乎！⁴⁷

楊樹達雖肯定鍾泰用力甚勤且「勝義頗多」，然亦列舉了「駁高郵王氏父子之得失」、「糾諸家之得失」等幾部分詳加評述，而認為以上糾駁舊說，有得有失，另「對於舊說之失擇」亦有不妥之處，最末以「著者立說之得失」一節作總評。可以說就荀學知識的深化及傳遞，透過書評亦有推波助瀾之效。

四、結論

期刊在晚清民國以來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過程中，帶有重要的知識生產、傳遞及閱讀效用。晚清民初期刊性質多樣，通俗文章及學術專論兼有。撰述及閱讀者包含一般社會大眾，以及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人士，呈現眾聲喧嘩之狀。晚清以降西學知識的吸收及開拓，以及民初五四前後帶來的中西、新舊思想之對話，加上 1937 年以後全面抗戰爆發所帶動的民族主義及文化情感凝聚效用，近現代對於荀學之接受與詮釋樣態，與先秦以降兩千多年以來之傳統荀學，自有極大差異。因此上述討論，舉凡中學校刊課堂習作、大學演講紀錄，乃至期刊傳媒中

⁴⁷ 楊樹達：〈書評：荀注訂補〉，《清華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1937 年 1 月），頁 219。

的格言、書評、廣告等，都是傳統荀學知識型態所未見。然而，此一現代荀學知識傳播之途徑與多元聲音，在過去研究近現代荀學之論者當中，幾無涉獵或言及。因此，透過本論文之發端，或可指引論者注意近現代荀學與期刊文本結合，進而對相關議題探研深掘，拓展新穎之論域。

一般而言，期刊的編輯策略及學術趨向，往往決定了學人投遞到與文章內容屬性相近的刊物，然而文章內容與學人受學背景，有時不見得一定貼合，甚至學人不同時期撰述文章風格可能南轅北轍，投遞刊物之學術趨向亦可能差距甚遠。就民國以來兩個在學術界影響力頗大的刊物：《東方雜誌》與《新青年》為例，《東方雜誌》於1904年晚清時期即創刊，終刊於1948年，可以說是近現代中國發行最久的雜誌。其撰者及閱讀者階層相當廣泛，然較多為受學於傳統之學者與社會大眾，因此被視為是文化保守主義派的刊物。相對的，《新青年》前身為《青年雜誌》，1915年由陳獨秀（1879-1942）在上海創刊，1917年將改名後的《新青年》遷到北京，自1918年以後成為北大新文化運動人士的同人雜誌。無論是上海及北京時期，《新青年》一直是積極批判傳統，鼓吹新文學、新文化的刊物，也因為此一激進路向，相對的《東方雜誌》就顯得過於持重與保守，因而常受到陳獨秀等激進文化主義者所攻擊。

以荀學為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被胡適稱頌為「手打孔家店」的英雄吳虞（1872-1949），早年在成都尊經書院學習經學，後留學日本，不僅曾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6號發表〈吃人與禮教〉掀起批判傳統禮教文化的浪潮，稍早吳虞也在《新青年》刊載〈讀荀子書後〉一文，其中就指出《荀子·禮論》所云：「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為共和體制的障礙。吳虞說道：「荀卿則三本並稱。尊王尤甚。其不合於共和一也。」⁴⁸吳虞還引夏曾佑之說，進一步指出：

李斯本孔子專制之法，行荀卿性惡之旨，卒至具五刑，黃犬東門，父子相哭，千古為之增悲。皆荀卿以持寵固位終身不厭之術，為臣事君之寶之教

⁴⁸ 吳虞：〈讀荀子書後〉，《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頁2。

害之也。夫尊君卑臣，患得患失，至於教之持寵固位，以順為正，同於妾婦終不免於禍國亡身，去公僕之義絕遠，其不合於共和二也。……正名篇曰：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郝懿行解云。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偕之大道，而不可與共明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不合於共和三也。然則吾國專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啟之，孔子教之也。⁴⁹

一個曾受學於傳統書院學習經學的士大夫，到了《新青年》的陣營中，其言論完全符合《新青年》批判傳統之精神，即使其文字操持仍為成學過程熟悉的傳統「文言文」，但無礙其新思想在《新青年》所展現的激進態度。然而，在新文化運動同一時期，與吳虞曾經同為反傳統先鋒的陳獨秀，到了1937年尚未達耳順之年，即已被激進的文化思潮與政治鬥爭推入到「保守」派陣營，只能在《東方雜誌》發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展現其自幼成學過程裡受乾嘉考據影響的成果：

成相篇：原文為請布基，慎聖人，人字非韻，義亦不可通，今依俞樾改「慎聖人」為「慎聽之。」聖聽二字形聲義俱近，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慎聽之三字，本仲尼燕居。……賦篇後世魚韻字流變入虞者，蓋為其中合口之字如矩、渠、等，以其首韻母為合口之u故，猶之支（ia）之入脂（i），以其首韻母為齊齒之i故。此種流變，六朝時始盛行於北方，當時南方詩人之用韻，魚虞尚多不混，此陸法言所以有支脂魚虞共為一韻之非議。⁵⁰

這樣的文字與治學趨向，實在難以與《青年雜誌》創刊號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激進的言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⁵¹相提並論。

⁴⁹ 吳虞：〈讀荀子書後〉，頁2。

⁵⁰ 陳獨秀：〈荀子韻表及考釋〉，《東方雜誌》第34卷第2號（1937年1月），頁67及71。

⁵¹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頁2-5。

1918-1919 年曾撰文批判《東方雜誌》⁵²的陳獨秀，晚年卻僅能以聲韻知識研究《荀子》刊載於《東方雜誌》，亦未嘗不是思想史上的弔詭與背反。

1931 年陳寅恪在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曾說道：

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而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⁵³

如果將陳寅恪的概念作一轉語，相較於民國以來有系統的、脈絡化處理的「中國哲學史」或「荀學研究」專著，散逸在期刊裡頭諸多荀學觀念的闡揚，乃至因應時代的「借題發揮」，何嘗不是近現代荀學史中的一環？且其數量龐大，包括知識菁英及一般普羅大眾的話語。就期刊相關荀子學術文獻來說，本文的討論並不在於針對相關期刊言說是否符合先秦荀子觀念以作價值評判，相對的，本文較聚焦於從知識傳播、閱讀接受以及詮釋者的角度，來考察清末民初學人及相關文化界人士，如何結合時代思潮及政治社會所需，藉以詮釋並發揮荀學相關觀念。

⁵² 詳見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頁206-212。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48-161。

⁵³ 陳寅恪：〈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學衡》第74期（1931年3月），頁9-10。

一般來說，報紙或期刊常常讓吾人可以觀察到眾多知識菁英以外的其他學人著述，這些名氣較為黯淡的學人，一樣任職於大學機構從事教育，或也包括一些學術殿堂以外的民間學者，他們的發言亦是民初學術現象之一，作為民國學術潮流中的一環，他們大量的身影及發言是不應該在菁英著述之外而被埋沒。尤其報紙或期刊曾留給這些學人發言的舞臺，如何還原歷史現場，重新檢視晚清民國學術史，在報紙或期刊的學術史料當中，自是不能忽略這些學術菁英之外的身影。事實上，一些「未得大名」的學者所提出或構造的知識系統，在法國學者傅柯（Michael Foucault, 1926-1984）看來，有可能是歷史的「斷裂」之處，因為其與常規的軌道脫節，與平均的水準背離，是時間順序與邏輯順序上的突發性現象。⁵⁴相對的，法國年鑑學派也反對過去史學強調王朝、政治上的變動對於民眾生活影響的決定論，它著重於歷史中緩慢深刻的生活樣式變化之探討（如人的食衣住行、體質或醫療技術的變化）。⁵⁵可以說，報紙或期刊在貼近中產階級乃至庶民生活層面上，都比其他出版品來得更為廣泛。其中學者論述或一般訊息刊載，在思想、學術史上隙縫的填補作用也不言可喻。

晚清以降，荀學便與西方“sociology”（嚴復譯為「群學」；日譯漢語為「社會學」）概念相連結，有了深度的對話與討論。從「社會」意義來說，思想的傳遞無法脫離其物質性的存在，不論是人、講學之所，乃至文字附著的書籍、報紙、期刊……等，即便金錢物價等波動，對於「知識」文本的傳遞效應與讀者的涉獵接受，都有某種程度的連結關係。因此，報紙或期刊中的學術史料，應當放在整體的知識形成以及傳播、閱讀等動態歷程來考察，而非僅止於學術文字的意義捕捉而已。本文透過期刊討論荀學知識的生產、傳播，以及讀者接受等相關課題，立意也即在於此。

⁵⁴（法）傅柯（Micha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頁 69-89。

⁵⁵（法）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顧良等譯：〈長時段：歷史和社會科學〉，收於：《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頁 173-204。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楊大膺：《荀子學說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

（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9年）。

（法）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著，顧良等譯：《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

（法）傅柯（Micha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

（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陳志宏等譯：《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英）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汪一帆等譯：《知識社會史（下卷）：從〈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

（二）期刊論文

丁留餘：〈荀子性惡論與其哲學〉，《約翰聲》第37卷第2期（1926年），頁101-109。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第96期（1905年4月），頁1-5。

不著撰人：〈經濟：普通經濟學：論慾望〉，《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4月），頁25-32。

不著撰人：〈箇人說〉，《東方雜誌》第3卷第10期（1906年9月），頁205-208。

不著撰人：〈敬求學界同人發起名約會啓事〉，《東方雜誌》第15卷第3號（1918年3月），頁153-154。

不著撰人：〈影印荀子集解〉（「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20卷第6號

(1923年3月)，頁數不詳。

不著撰人：〈荀子〉（「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23卷第8號（1926年4月），頁數不詳。

不著撰人：〈民國十五年度入學試題：國立北京大學本科：國文〉，《全國專門以上學校投考指南》第5期（1927年），頁19；67-68。

不著撰人：〈荀子哲學〉（「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26卷第4號（1929年2月），頁數不詳。

不著撰人：〈發刊詞〉，《進步英華週刊》第1期（1930年10月），頁1。

不著撰人：〈影印荀子集解〉（「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31卷第3號（1934年2月），頁數不詳。

不著撰人：〈荀子性惡篇（中英文對照）〉，《進步英華週刊》第55期（1936年1月），頁2。

不著撰人：〈荀注訂補〉（「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33卷第21號（1936年11月），頁數不詳。

不著撰人：〈荀子束釋〉（「圖書廣告」欄），《東方雜誌》第33卷第22號（1936年11月），頁數不詳。

平海瀾：〈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ED：荀子性惡篇（節錄）〉，《英文雜誌》第3卷第5期（1917年5月），頁385-386。

江謙：〈發刊辭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友會雜誌》第1卷第1期（1918年9月），頁1。

吳虞：〈讀荀子書後〉，《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頁1-3。

吳統續：〈荀子統一主義之評論（再續）〉，《法政學報》第3期（1918年5月），頁1-6。

吳熙：〈荀子的名學〉，《學生雜誌》第12卷第9號（1925年9月），頁30-36。

李俊：〈荀子與霍布士（Tomas Hobbes）〉，《珞珈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2月），頁293-302。

杜而未：〈孟荀性論與人性要求〉，《上智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4-5期（1947年7-10月），頁291-296。

- 易白沙：〈諸子無鬼論〉，《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頁15-26。
- 倚劍生：〈論中國政教宜求進化〉，《東方雜誌》第3卷第5期（1906年4月），頁99-104。
- 唐慶增：〈荀子之經濟思想〉，《大夏季刊》第1卷第1期（1929年5月），頁35-52。
- 容媛：〈國內學術界消息（二十五年六月至十二月）：（乙）出版界消息：3·荀子束釋〉，《燕京學報》第20期（1936年12月），頁606-608。
- 張士濤：〈荀子議兵篇云兼併易能也惟堅凝之難焉試申論之〉，《青年鏡》第44期（1925年），頁34-35。
- 張廷健：〈荀子名學（即論理學）〉，《北京朝陽大學旬刊》第3卷第14期（1925年9月），頁2-7。
- 張培宗：〈荀子哲學的研究〉，《真光》第25卷第2號（1926年2月），頁47-62。
- 張東蓀：〈從中國言語構造上看中國哲學〉，《東方雜誌》第33卷第7號（1936年4月），頁89-99。
- 梁啓超：〈政治學案第三：霍布士學案〉，《清議報》第97期（1901年11月），頁1-3。
- 梁任公講，吳其昌記：〈讀書示例：荀子〉，《清華週刊》第24卷第13期（1925年12月），頁1-6。
- 陳獨秀：〈敬告青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頁1-6。
- 陳獨秀：〈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頁206-212。
- 陳獨秀：〈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頁148-161。
- 陳獨秀：〈荀子韻表及考釋〉，《東方雜誌》第34卷第2號（1937年1月），頁67-75。
- 陳寅恪：〈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學衡》第74期（1931年3月），頁9-12。

- 賀麟：〈康德譯名的商榷〉，《東方雜誌》第33卷第17號（1936年9月），頁181-196。
- 雲鉞：〈浩布士與荀子政治哲學之比較〉，《清華週刊》第26卷第7期（1926年11月），頁601-610。
- 楊樹達：〈書評：荀注訂補〉，《清華學報》第12卷第1期（1937年1月），頁219-239。
- 劉少少：〈儒家之兩大法學派〉，《東方雜誌》第15卷第10號（1918年10月），頁79-88。
- 劉叔雅：〈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鉤通〉，《東方雜誌》第16卷第12號（1919年12月），頁162-168。
- 樊仲雲：〈讀書界與出版界〉，《出版週刊》新119號（1935年3月），頁11-13。
- 儲炳源：〈荀子之論理學說〉，《弘毅日誌彙刊》第1期（1920年），頁34-38。
- 譚戒甫講，陳衍佛記：〈荀子正名篇講記〉，《東方雜誌》第32卷第7號（1935年4月），頁157-165。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ading in Xunxue's Knowledge: Taking Chinese Modern Periodicals as the Core

Chou, Chih-Hu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forms, important concepts and related knowledge in Xunxue were often promoted throug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which triggered repercussions and discussions. Compared with the systematic and contextualized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Xunxue Studies*”...and other specialized works, the elaboration and promotion of many Xunxue concepts scatter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even the “experienced use of topics” in response to the times, is it not near A link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Xunzi? And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ave a huge number of Xun’s doctrines, including the discourses of intellectual elit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Xunzi’s documents is not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corresponding to or deviate from the pre-Qin Xunzi’s doctrines for value judgment, but to focus on the perspectives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reading acceptance, and interpreters to investigate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ow people related cultural figures integrated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used

the newspapers and public media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interpret and develop Xunxue related concepts. 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Xunxue, Modern Periodicals,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Reading Interpretation, Advertising, Book Reviews